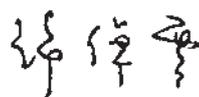


1840年以來的中國與美國



這期《二十一世紀》期刊，是為了慶祝楊振寧先生百年大壽。我祝禱這位學術巨人的智慧，能夠庇佑眾生，嘉惠中華。尤其希望中國的學者，如我一般有這種幸運，得到世上高人一言半語的指點。楊先生，仁者壽，智者不惑，際此慶壽良辰，晚晴紅霞，西山風清，我們祝您健康快樂。

楔子

中美之間的交往，假如我們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計算，幾乎已經有二百年了。美國這個年輕的共和國，初試啼聲。在如此漫長的過程裏，中美之間來往起起伏伏、恩恩怨怨，是個非常複雜的記錄。自從中國開關迎接世界以後，中美之間的糾纏，恐怕比歷史上中國與任何其他國家的關係都更為複雜，而且影響久遠。

所以，收到陳方正先生交託我寫這篇文章的使命以後，我兢兢業業思考了很久——我感覺自己應該寫：因為這個大題目，不僅關乎中美兩國，幾乎可以說兩百年來世界的命運，很多時候與中美關係密不可分。中美關係的轉向，往往導致世界歷史的轉向——當然，中國的命運也隨之發生改變，同樣美國的命運也就有所動盪。

我如此說的緣故，是因為二百年來中美關係的基本格局是：美國強勢，中國弱勢，強弱勢之間有主客之勢。由於美國本身的理念，有其立國的政策，也有其衡量自己當時在世界上的地位而作出的取捨，所以對中國的政策如有變化，也是美國採取主動。在此期間，中國被動的時候多，美國主動的時候多。

* 本口述稿由深圳行政學院副教授陳新華整理。

所以，討論這個問題，我常常會將上述角度，作為一條不斷變化的線索拉進來加以考量：美國在那個特定的時空，為甚麼如此做？在中美關係上，那個時空特性之下美國如此作為，又是如何影響其自身的發展方向，以及整體的國際平衡？隨之而來的世界局勢，是走向災難還是和平？

口授這篇文章的時候，其實我心裏也是五味雜陳。中國與美國的關係有恩有怨，也有躲不開的糾纏。放眼世界，我們得到美國的幫助，確實比其他國家都更為重大，也更為深遠。但是中國更被美國牽制，而被迫走向許多意想不到的方向——這不是中國所願意的，對中國整體的歷史也有很大的影響。

一 中美之間的貿易

1840年，英國與中國打了第一次鴉片戰爭。其實，當時在香港活動的鴉片商人不止英國人，也有美國人在內。美國這個成立不久的新興國家，也跟着英國參與國際貿易——中國貿易這塊肥肉，它必須染指。當時跟義律(Charles Elliot)謀劃該如何用強力打開中國的貿易大門，也有美國商人帕金斯(Thomas Perkins)參與其中。到今天，帕金斯家族還是美國新英倫世族大家中很重要的一份子。他們也一樣，用船隻帶來鴉片，帶走中國的瓷器、茶葉等商貨。但這種貿易並沒有獲得中國法律的許可，等於是強行打開中國大門。第一次鴉片戰爭動兵的雖然是英國，但是贊助者之中也有在香港的美國商人。

這次戰爭中國戰敗，被迫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1844年，美國派出使者顧盛(Caleb Cushing)，和中國的總代表、兩廣總督耆英簽署了《望廈條約》。自此，中美兩國建交，而顧盛是第一任公使。就任公使後，顧盛說自己心裏很興奮，也覺得這是個艱鉅的責任。這個最年輕的國家，剛剛從內戰中拔出來，第一次涉足世界政治、國際關係，居然就與世界上壽命最長的東方帝國正式建立關係，他認為這是人類歷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我住在美國賓夕凡尼亞州的匹茲堡，在此順便講一件對我而言很有意義的事情。1784年2月2日，也就是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生日當天，「中國皇后號」從紐約港開往中國，這是第一條美國派往中國的商船。他們帶來的不是鴉片，而是三十噸從匹茲堡附近採集的野人參(在中國被稱為「西洋參」或「花旗參」)，以及皮革、胡椒、棉花等商品；從中國帶走的，則是瓷器、茶葉、絲綢等商貨——這是當時典型的中美貿易裏中國銷售到美國的商品。

有好幾次，我作為中央研究院的工作人員訪問哈佛大學，交涉合作事務，住的地方都是哈佛的賓館。這個賓館是新英倫的老式住宅，木頭房子，古老的木牀，房間裏都是美國商人早期運來的中國瓷器。除了中國本身的瓷器以外，還看得出專門為美國和英國燒製的貿易瓷，也看見中國的絲織品作為裝飾。如此情景，令我也覺得時空顛倒：一個中國年輕人代表中國的學術

機構，到美國的最高學府交涉兩國學術合作的事業——而住的房間裏，圍着我的居然都是古老的中國物件。這是值得紀念，也值得我一輩子回憶、感慨的事情。

從此以後，美國的商船紛紛進入中國。那時雖然已有機輪船，但很多船是機帆混用。「中國皇后號」是相當大的機帆混合船，「中國飛剪號」就更大了，速度也更快。到1860年左右，貿易商船從北美出發的港口有三個：舊金山、洛杉磯，以及加拿大的溫哥華。它們定期來往，穿梭於兩岸之間的太平洋。

十九世紀下半段，美國經歷了內戰。整體發展方向，從開發新土地轉變為進入工業化。而且美國的開發，最重要的項目是向西建築跨州的大鐵路，以及在西半部開發農田、建設都市。這些工作，數十萬中國勞工提供了重要的幫助。

換而言之，美國之成為美國，從一個舊日的英國殖民地轉化為橫跨兩洋的大國，對於太平洋這邊的東亞，這一過程具有重大意義；對於中美關係，也經歷了一段很不正常的過程。例如，作出重大貢獻的中國勞工，卻受困於《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不能如同歐洲勞工一樣，移民進入美國。而美國成為橫跨兩洋的大國，它的工業產品，很自然比歐洲還要更方便地進入中國市場——前此中國日用品輸入美國的貿易方向，卻從此轉為美國的產品進入中國市場，與歐洲人爭奪這個地廣人多的舊日帝國的貿易市場。

從那時開始，這些往來的航船，帶去了無數中國青年赴美接受教育。第一批是容闈帶去的一百多名中國幼童，進入美國的中學深造。這些當年的「留美幼童」學成歸國後，在外交、商務、教育各個領域工作。中美關係的這一環起步，對中國人的意義無法估量。這些人帶來的美國影響，延伸到後來所謂「庚款」(庚子賠款)留美的學生——這其中，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是胡適；當然，還有許多其他人物，包括我的恩師李濟。將「庚款」留學的學生名單拉開來看，幾乎等於一張中國現代化的「里程表」：其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對中國現代化作出重大貢獻，或者是開創性研究領域的學者，或者是開創偉大事業的奇人，也包括駐美大使以及在中華民國外交部主持對外事務的人物。這裏面也有革命家；當然，開創革命的那批人中，留法學生比較多。可是在後來的發展過程中，留美學生在國共兩黨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二 美國與近現代中國的教育

二十世紀初，世界的變化也很大。以機器工業生產商品的資本主義經濟，迅速而大規模地吞噬了整個世界。白種人在這一劇變之下，不僅成為世界的主人，而且他們之間也要爭奪剝削世界的「龍頭」地位。在歐洲，出現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在那次大戰中，資本主義經濟第一次面臨試驗：國際共產

主義的萌芽和茁壯，將世界帶入左、右的劃分；在西方現代國家體制中，出現了一個公權壓過私權的共產制度，以及與之共生的社會公益和社會福利的理想。美國在歐戰晚期才進入戰爭，潘興 (John J. Pershing) 將軍率領美國參戰部隊，向英法宣稱：我們回來了，我們參加了舊大陸的共同事務。在中國歷史上，「西方」二字也從此有左、右兩方面的劃分；而這個界劃，使得中國脫離舊日帝國的掙扎過程，必須有所選擇。

在輸入西方理念的進程中，美國傳教士在中國設立學校，是一個重要的過程。同時，美國的知識份子，包括旅行者、記者、商人與教育家，他們帶到中國來的理念，也因此至少有兩條路線，作為他們自己的選擇，而又使得中國人必須有所選擇。同樣地，他們從中國帶回去的印象，也從此有左、右兩種面貌和形象，出自他們主觀的選擇，也出自他們主觀的描述。

美國人在中國最早設立的學校，是來華傳教士在教堂裏開辦的附屬中學。我們已經很難說，究竟哪所中學開辦的時間最早。北京的協和醫學院是中國第一家現代醫學院，還有湖南的湘雅醫學專門學校、四川的華西協合大學、山東的齊魯大學等，都是美國為多數的傳教士所創立。協和醫學院採用現代醫學教育與全科醫院結合的方式，在中國成為模範。他們的影響一直延伸到比較偏僻的省份，比如山西的銘賢學院，也是美國傳教士設立的。民國時期，除了上述醫科教學外，像燕京、東吳、金陵、之江大學等著名學府，都是美國傳教士主持創辦的，對近代中國的發展做出巨大貢獻。在史學領域，燕京大學的《燕京學報》、中研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及清華大學的《清華學報》並稱「三大學報」。清華是美國取得「庚款」回饋中國而設立的，時至今日，海峽兩岸的清華還是非常重要的學府，尤其北京的清華是中國大學的「龍頭」。

我讀書的輔仁中學，是在上海的中國基督徒回到家鄉無錫建設的。他們認為自己雖然不是傳教士，但也以虔誠信徒的服務精神，按照英美中學的教育程度和教學方法來設立學校。這批輔仁中學的教員，對我的訓練雖然只有兩年半（從高一到高三上學期），於我一生卻具有極大影響。

從大學教育到中學教育，美國對中國的影響深遠無比。醫藥與教育方面，都是傳教士注目的地方。1937年，美國醫藥援華會 (American Bureau for Medical Aid to China) 成立，這批與中國有關係的人，基本上都是來華傳教士。他們回到美國，鼓吹在抗日戰爭期間要幫助中國，捐助中國醫藥、設備和醫生。在中國被封鎖、極端困難的時候，一飛機一飛機的美國援華物資，經由「駝峰航線」進入中國。這裏包括剛剛發明的青霉素，正式出廠後的第一批就被運輸到中國，對中國的傷兵有極大的幫助。

直到今天，我們也應該感激他們。美國對中國的文化生命有重大影響——可以說沒有任何其他國家，如此全面、無私地幫助我們。很多傳教士留在中國，在此終老；很多傳教士以中國為故鄉，他們說「我的家鄉在中國」；很多傳教士在抗戰期間保護中國的兒童，保護中國的傷兵，保護中國的逃難

者。以南京大屠殺而論，金陵女子大學被劃作「保護區」，成千上萬中國婦女逃進去得到救助，避免了被日本人蹂躪。

如此種種，令我們感慨叢生。但是，我們也有糾葛。美國對華貿易之中，幾乎永遠是美國出超，中國入超。而且非常遺憾的是，早期的鴉片貿易中，美國一樣扮演了可恥的角色：論輸送到中國的鴉片數量，美國不見得比英國少——英美兩國，是最大的鴉片貿易商人。

三 中美之間複雜的恩怨

中美之間更大的恩怨，是在戰爭中間出現。第一次美國介入中國的戰爭，是在太平天國之亂時。當時上海租界裏洋人很多，中國逃難過去的人也很多。1860年，美國人華爾(Frederick T. Ward)領導組建了一支「洋槍隊」，這批僱傭兵人數不多，非常精銳。最初是為了保衛上海租界，後來離開租界幫助李鴻章的淮軍，以及湘軍曾國荃的部隊。此後，在平定太平天國的戰爭中，他們屢立戰功。

清朝末年，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在初期是以美國的民主憲政作為模式——雖然他沒有認真地認識美利堅合眾國開國以後內部種種的辯論和掙扎，也沒有研究美國內戰對美國政治制度的影響。後來對「三民主義」的「民權」，他只是籠統地交代。可孫中山在廣州開府之後，有一段最重要的掙扎，他擺脫了日本浪人「玄洋社」的影響，卻又從歐洲新出現的國際共產主義獲得支持，也接受了他們部分的理念。更重要者，孫中山為建設新中國而組織的第一支革命軍，是以黃埔軍校的名義，接受了在俄國的共產國際送來的八千支步槍。

在孫中山的構想中，民生主義的原型是「耕者有其田」。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的農民革命軍，包括前述「太平天國」起義者，共同具有的梦想。而在廣州開府以後，與共產國際合作，使國民黨內部出現了左、右的對立，也使他的「民生主義」的內涵有了根本改變：「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孫中山理想的改變，也使得中華民國成立的藍圖，在日後國共鬥爭中，不僅造成理念上的左右對立，也導致重要黨員之間的對立。在他去世後，所謂「寧漢分裂」，就是因此而起。而蔣介石領導的右派，從此失去了國民黨左翼的支持。

第二次美國介入中國的戰爭，是在抗戰期間。抗戰開始，中國在一個月內損失了八百架飛機，整個抗戰期間損失了近三千架飛機。日本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好的飛機，但中國沒有能力製造，只能從外國買來各種型號的飛機，將其組成一支雜湊的空軍戰鬥部隊。所以，中國的領空被日本人隨意糟蹋。中國軍隊作戰時，天上下來的炸彈比地上的子彈更令人無可奈何。

美國一個空中特技隊員陳納德(Claire L. Chennault)，組織不怕死的美國空中健兒，以私人名義成立了一支中國空軍美國志願援華航空隊(American

Volunteer Group)，號稱「飛虎隊」(Flying Tiger)。他們的隊員是賣命的特技飛行員，可以在飛行中的飛機上，從機艙裏爬出來，到機翼上行走。他們可以在農田中起飛，可以降落在穀倉的屋頂，可以在空中翻筋斗而不掉下來，甚至可以在飛機上垂下一根繩子，在半空中盪鞦韆。

最開始，他們使用的是美國空軍淘汰的飛機。「珍珠港事件」後美國參戰，將這支民間部隊整編為第十四航空隊，陳納德任少將司令。自從有了這支航空部隊以後，我記得從1942年開始，我們在重慶終於可以安然睡覺。我們的部隊與日本作戰，在天上也有了飛機掩護。中國在抗戰中，損失的飛行員以千計。慢慢地，我們的飛行員也可以駕駛與美國一樣的飛機，與「飛虎隊」並肩戰鬥。他們的恩德，我們永遠不忘。

雖然這些美國來的健兒也不是白飛：五兩黃金出勤一次，打下一架日本飛機獎勵十兩黃金。每個人回去時，帶着幾十磅的黃金。要知道，那時候黃金的價值與今天不一樣；但這些年輕人中，將生命留在中國大地的，為數也眾多。如今我們估計，1942到1945年，他們損耗了約四百人。至於他們是為財而死，還是為義而死？我們可以不計較。

我們特別要提及的，是中美間的商業來往。上海與其他通商口岸的租界，都有許多國家的銀行，其中最大的是英國和美國的「銀行群」，尤其是英國的滙豐銀行和美國的花旗銀行。滙豐銀行現在還是世界上最大的銀行之一，美國的花旗銀行參與中國財政運作最多。原因在於，中國最早懂得現代財政的財政部長是孔祥熙和宋子文——宋子文就讀於哥倫比亞大學，孔祥熙則畢業於耶魯大學，他們將全美國最重要的銀行設施帶到中國。所以，中國第一個中央銀行是按照美國銀行設計、運作，並將花旗銀行當做友行，透支的時候由花旗銀行做後盾。假如沒有這個後盾，蔣介石的中央銀行不會有信用；而中央銀行是蔣介石統一中國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不只是依靠他的軍隊，而且是憑藉一個現代的金融體系。

可以說美國的金融制度，經由上海的交易所，將中國的金融制度整體納入其中。上海證券交易所是東方第一個國際性交易所，和華爾街、倫敦以及東京證券交易所，成為四個重要的世界金融交易點。這就將中國現代財政、現代經濟運作，全部捲入世界經濟網。這一點很少人注意，但是我必須表揚。這一結果之下的中美關係，是恩是怨，是仇是報，很難說。因為這期間，美國榨取中國財政的時候多，幫助中國財政的時候少。但以這個制度輸入中國而言，可以說全世界沒有任何第二個國家，能夠整套地將自己的金融系統輸入他國，而且將自己最重要的銀行作為其後盾。蔣介石在北伐成功以後，如此迅速地建立中國的現代政府、現代工業、民族工業、國防事業，等等，都與美國背後的金融支持分不開。

另一方面，因為義和團之亂，八國聯軍侵入北京，擊敗了清軍，從中國取得4億5,000萬兩白銀賠款——當時中國人口有4億5,000萬，相當於每人要出一兩白銀作為賠款。這筆賠款史稱「庚子賠款」，俄國與德國所佔比例最

大，其次是法、英、日、美、意等國。日本將這筆賠款以及先前取得的甲午賠款，用作國內的經營建設，成為後來強佔東三省，乃至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最大的本錢。美國將這筆賠款部分退還中國，作為後者發展教育的專用款；隨後，英、法等國分別退還了部分賠款。這筆經費對中國的教育幫助極大，清華就是在它的支持下建立的。每一家新的國立大學建立時，都從「庚款」中撥出費用來支持建設——從兩江師範學堂改制而來的中央大學，以及各地的國立、省立大學都是如此。一直到最後，台灣清華復校，用的還是「庚款」中很小的一筆餘款。

從1909年美國退回部分「庚款」支持中國的教育，到1964年台灣清華復校，如此長的時間裏，「庚款」都對中國教育持續產生作用。但倒過來講，「庚款」是中國背負的巨大的債務。這一批外國銀行團向中國放債——中國沒有巨資償付賠款，只能向世界銀行團借錢支付。等到退款時，當初的借款也存在世界銀行團，只能支取利息，而且要扣除自己需要用的。

最後一筆「庚款」付款，是先父伯翔公以海關監督的身份，轉任財政部部員時經辦。1942年不平等條約解除後，他專責清理「庚款」餘數以及賠償方式。在艱難困苦的抗戰期間，這筆債款西方人沒有饒恕我們。先父那時五十歲左右，每次晚上回來，看着那一筆筆賬，心裏十分難過。

1941年12月7日，聖誕節前夕，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參戰。終於，因為盟國成員的身份，中國取消了所有不平等條約。這就等於解除了中國背上數十年的包袱。此後，美國和中國的關係進入一個新階段。原本民間身份的「飛虎隊」變為美國第十四航空隊，中國的遠征軍也從騰衝走出國門，去搭救緬甸的英國軍隊，這支軍隊被編入盟國中英美聯軍的指揮序列。美國還派了一位代表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將軍，作為中國的戰區參謀長——史迪威本想做中國戰區總司令，指揮全中國的軍隊，但蔣介石不同意。此後，美國的軍隊介入中國的軍事，也是恩恩怨怨糾纏不休。

抗戰最後兩年的作戰，美國飛機飛越「駝峰航線」，給中國運來物資，也經由這條航線提供飛機予中國空軍使用。在陸地上，還打通了印度經由緬甸通往中國的道路——史迪威公路，一車車的物資進入中國，這些都在史迪威的指揮之下。中國調用這些軍隊時，需要得到史迪威的許可。中國軍隊在前線作戰、分秒必爭的時候，因為他要看作戰計劃，往往貽誤戰機——千里以外的戰場，戰況瞬息萬變，如何提供作戰計劃？這使得中國最後一段作戰，仍舊非常艱苦，因為旁邊有人掣肘。當然，最後一次常德作戰，若不是有美國軍機遠道運輸援軍趕到常德，我們擋不住日本人的長驅直入。這是美國給予中國的很重大的幫助。

史迪威公路的中國部分，是在雲南群山之中，由各地少數民族的村民用手開鑿出來的。兩千多部卡車，從緬甸進入中國——其實美國贈送給中國的車大概有四千輛，有一半在史迪威公路上翻車了。這些車都是由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等地的華僑青年，到緬甸投軍、作為志願者開進來的——他

們沒學過駕駛這種車，兩千多人永遠留在了山溝裏。這些華僑青年本想回祖國幫助抗戰，卻連祖國的土地都未曾踏足。

在抗戰初期，為了爭取美國的援助，中國駐美大使胡適在全美各地作了五六十次講演。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女士也特地在美國國會發表講演，使美國人對中國的印象，擺脫了經由在美中國勞工得出的固有認識。同時，美國的記者以及作家，尤其賽珍珠 (Pearl S. Buck) 和《時代》(Time)、《生活》(Life) 雜誌的發行人路斯 (Henry Luce，漢名路思義)，不斷向美國公眾講述中國在苦難之中的掙扎。可是另一方面，中國北方在日本的戰線向西推進時，八路軍派往敵後的幹部掌握了農村。在那些地區的美國傳教士以及訪華人員，後來又包括美國大使館、領事館的職員謝偉思 (John S. Service) 等人，將北方的消息傳送到美國。其中，斯諾 (Edgar Snow) 的新聞報導，具有無可估量的影響力。

這種輿論的分歧，再加上史迪威和蔣介石之間的對抗，使得中美之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最後一段的關係與配合，發生重要的衝突。二戰以後，美國緊接着出現了「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造成美國內部左右之間的嚴重分裂。那一裂痕，又導致了所謂「誰丟失了中國」的辯論。更進一步，美國以同樣的心態，回頭看二戰後的歐洲。俄國的崛起與中國的分裂，導致二戰後近二十年，美國對自己領導的世界及與此相關的外交政策，都趨向對共產主義國家的抵制和圍堵。

抗戰結束後，國共內戰開始，美國莫名其妙地糾纏其中。美國派遣外交官謝偉思等人組成的「迪克西使團」(Dixie Mission) 參觀延安，他們回來說：延安是未來的希望，重慶是黑暗的地方；重慶是要沒落的，延安要起來；幫延安，不要幫重慶。有這樣一個同盟國在旁邊，說是幫國民黨的忙，卻決定了要幫它的對立方。這其間的恩恩怨怨，我們很難說。

四 「圍堵政策」下的國際格局

經過五年內戰，國民黨退居台灣。這一段時期，美國曾有深入的檢討，也確定其國策所在：如何防堵蘇俄和中國的聯合戰線？所謂「自由世界」，也就是英美領導的歐洲和美國，該如何面對社會主義陣營？主張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國家，與奉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國家，二者之間是和平相處，還是處處對抗？這是當時美國政府非常掛心的事情。

1947年，杜魯門 (Harry S. Truman) 總統就以上問題徵求馬歇爾 (George C. Marshall)、艾森豪威爾 (Dwight D. Eisenhower) 和麥克阿瑟 (Douglas MacArthur) 這三大元帥的意見後，採納「圍堵政策」。1946年2月22日，駐守莫斯科的美國大使館代辦凱南 (George F. Kennan)，向國務院發送了著名的「長電報」(Long Telegram)。凱南的建議定下了美國對戰後世界的規劃：「圍堵政策」(strategy of

containment)。從杜魯門時代一直延伸到尼克松 (Richard M. Nixon) 時代，都在這個方向做種種的外交措施。而在尼克松時代，基辛格 (Henry A. Kissinger) 規畫了「聯繫」(engagement) 政策。但是，從整體原則而言，「聯繫」也只是手段，是想在「圍堵」之中，設法闖出一個缺口。所以，「圍堵政策」可以說是幾十年來，美國處理世界事務的最高原則。直到最近，這一政策演化成手忙腳亂的局面，這是當時沒有預料到的。

回顧 1947 年至今，七十多年來，西方世界大多是在這個「圍堵政策」的統治下：美國自我期許，應該擔起自由世界、自由經濟的「防衛者」這個責任。所有可能出現的「缺口」，都要盡量堵上——從北海延伸到鄂霍茨克海，從柏林延伸到庫頁島。這一條漫長的戰線，中間以蘇聯為主，而中國作為沒有指明的「夥伴」——中國的「夥伴」身份，究竟是靠向哪一邊？這個電文裏沒有敘述。

關於這一政策的落實，美國決定以前述三大元帥作為主要執行者。第一步是馬歇爾以國務卿的身份，主持旨在推動歐洲復興的「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官方名稱為「歐洲復興計劃」[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同時以美元援助希臘、土耳其——這兩個國家，是蘇俄艦隊由裏海、黑海進入地中海的要道。在東方，日本投降以後，麥克阿瑟要將日本與韓國打造為「東方的民主堡壘」，親自主持東線的防守。杜魯門退任以後，接任的是艾森豪威爾，三大元帥維持了這個局面幾十年。其中的插曲是杜魯門無法忍受麥克阿瑟「將在外不受君命」，從韓國召回這一悍將。但是，馬歇爾與艾森豪威爾忠誠地執行了這一政策。

這個政策在東方的第一步，是美國第七艦隊開始巡防海峽，使得孤懸在大陸海邊的金門、馬祖——這兩個中華民國僅存的基地得以保全。青島本來是美軍駐華的海軍基地，美國人卻在真正捲入中國本土戰場前撤離了。否則，駐守青島的美軍，將會與駐韓美軍形成呼應。這個決定，引發下面一連串東亞的變局。美國強化菲律賓的基地，將日本和琉球作為美國東方防線的重要據點，加上台灣，構成圍堵中國的「第一島鏈」。這個政策維持之長久、執行之着力，影響之深遠一直到今天。

假如內戰中，國民黨的軍隊完全打光，美國將不得不設法與中國大陸直接打交道——如此政策下，美國就有了支持國民黨的理由。從那時開始，美國拒絕與中國大陸來往，而且努力維護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地位。即使 1971 年，中華民國已經被迫退出聯合國，中華民國與美國之間的關係還是維持到 1978 年，直到北京與華府正式建交為止——「中華民國」變成世所罕見的「身份不明」政體。

冷戰開始後，防守台灣成為美國的任務之一。對於中華民國而論，假如沒有美國這顆「定心丸」——美國將防線劃在台灣海峽——的話，台灣這個基地的建設不可能展開。台灣幾十年的努力，替中國的海外部分開創了一片新的天地。這片新天地，和海峽另一邊本土之間的恩恩怨怨，到今天還無法解

除。將來怎麼解決這些糾紛？如何才能「破鏡重圓」？如何能讓台灣建設的成果、台灣的人才、台灣的經濟基礎，與大陸的經濟建設可以互相支援？我們今天無法預料。這要靠我們華人的智慧，思考如何能夠顧及中華血脈。當然，關於「中華血脈」這四字，民進黨與我的想法不一樣。

事實上，兩岸在經濟建設方面曾經互相支援，從1970年代至今沒有停止。大陸的經濟建設，比台灣晚了大約二十年，因為中間經歷了三十年嘗試種種政策導致的顛簸及動亂。從鄧小平主政時期開始，到今天雙方的合作和溝通，由兩邊的海峽事務委員會當「白手套」，由外國的元首如李光耀等作為「中間人」。港澳還未回歸以前，是兩岸很自然的接觸點。

第二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蔣經國開啟的台灣體制改革。他宣告：「我們蔣家人不再介入政治。」後來，李登輝改變了台灣的基本大法——到如今，台灣的「中華民國」只剩四個字了，實質上本土人士已完全取得政權。但弔詭的是，美國政府繼續承諾「要以全力保衛台灣」，這個說法成為國際關係史上前所罕見的一個例子。熟悉國際事務的人士，曾經用「有心的模糊」(intentional ambiguity)形容如此安排。

在中國歷史上，從春秋轉入戰國的時代，晉國曾是「五霸」裏實質上的領袖。晉國佔有其盟國衛國的乾邑。晉國的霸權在那時也已日薄西山，內部終為韓、趙、魏三家瓜分，中國歷史進入戰國的「七雄」時代。那時真正有實力競爭霸主的，是秦、楚兩個邊緣大國——夾縫裏出現的吳、越兩個霸主，都只是曇花一現。秦、楚這兩個邊緣大國競爭，最終秦國統一了神州大陸，成為「中華帝國」的前身。而秦國統一中原的過程及其所建立的制度，實際上約束了中華帝國兩千年的形式，到1911年方才改變。在此，我以中國歷史上的這個例子，來預見美國幾十年來的霸權日後可能的變化。

美國的霸權建立至今，東亞遭遇了諸多危機：一次韓戰、兩次越南戰爭——日本和韓國則淪為美國實際上的「屬地」，沖繩的地位變得不明不白。而這些，都是「圍堵政策」的後果。美國如此稱霸，它在別國之內可以像晉國取得衛國的乾邑一樣——乾邑在當時中原的東半邊是個據點，晉國在北半邊指揮不動。這個情勢，就很像東亞「島鏈」情形。弔詭的是，晉國分出來的趙國最後將乾邑奪走了。將來美國會不會將台灣轉變成日本、韓國的「延伸」？我們無法預測。

再看歐洲的局面。「馬歇爾計劃」以後，美國以組建北約(NATO)、歐盟的方式，以英、法、德三國——過去的敵人德國作為重點，扼守在歐洲中心地帶。數十年過來，如今歐盟已經感覺到：當年的美國是為了保護他們，如今的美國卻成為他們的主人。美國為了保衛歐洲，花費了極大力氣。「馬歇爾計劃」真是從斷壁殘垣之中，重新建立了一個花團錦簇的世界。如今的德國，其繁榮的經濟基礎，與今天我們看到的美國不一樣——英、法敗下陣來了，德國上來了。

美國在戰後，將德國一分为二：一半由西方佔領，一半由蘇聯佔領——如同朝鮮與韓國、南越和北越的劃分一樣。柏林是獨立市，又在中間建了一道「柏林牆」。1948年第一次柏林危機，蘇聯封鎖柏林，美國長達數月空投糧食、漢堡、熱狗、牛奶、雞蛋乃至紙張等生活物資，飛機在跑道上沒有停過。那一筆開支相當驚人。

1963年6月25日，肯尼迪 (John F. Kennedy) 在柏林講演——「作為一個自由人，我無比自豪地說：我是一個柏林人。」肯尼迪擔任總統以後，還曾經講過：我們不要忘記邱吉爾 (Winston Churchill) 與我們的老總統羅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 曾經提出，人類應當有「四大自由」(羅斯福與邱吉爾簽訂的《大西洋憲章》[*Atlantic Charter*] 其實有兩個「版本」：一個是長的「條約」，一個是短的「四大自由」的口號——免於恐懼的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我們義無旁貸，要做世界的衛兵，維護這「四大自由」。當年的肯尼迪，就以「四大自由」為理由宣誓：我們的任務，任重而道遠；不要問國家能為我們做甚麼，要問我們能為國家做甚麼；當年羅斯福總統實行新政以後，國家對國民盡責任，維持其起碼的生活水準——政府的責任，就是在美國的領土上實現「四大自由」。這些宣示非常動聽，而且美國人的實踐確實也非常努力。當初所劃定的界線，今天還依然存在——最近烏克蘭與俄國的衝突，還是因為美國「圍堵政策」所導致的。當年馬歇爾講：蘇維埃聯邦共和國是沙皇的俄國，有所有帝國最強暴、最殘忍、最兇悍的一部分。

前面我所講的，是為了說明凱南「圍堵政策」的文化背景、美國對自己的期許，以及做出的努力。從那時到現在，七十多年了，美國的霸權都在「圍堵政策」的話語體系下呈現。

中間還發生過古巴導彈危機。俄國想要在古巴設立一個導彈基地，美國堅決不允許。肯尼迪和赫魯曉夫 (Nikita S. Khrushchev) 對抗，彼此不相讓——最終蘇聯讓步，將部署在古巴的導彈撤回。而美國至今還佔着古巴的關塔那摩監獄 (Guantanamo Bay detention camp)，死也不肯讓出來：這是一個沒有法律管束的牢獄，美國在此審問的間諜、俘虜的囚犯，沒有任何人權法保護，被施以灌水、鞭打、電擊等酷刑，死了就將屍體扔掉。如此行徑，我常常用「弔詭」這兩個字形容：美國號稱要維護「四大自由」，實際上始終存在這樣一個「瘡疤」，卻視若無睹。

1957年，人類第一顆人造衛星由蘇聯發射成功。美國花錢費力，力圖保持太空的均勢，終於在1969年的尼克松時代，美國太空人首次登上月球。此前一年，美、蘇、英等五十九個國家，共同簽署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NPT*)。限制新的國家發展核武器，這對於世界而言是好事——至於已經擁有核武器的國家，會不會有人首先使用核彈，就是未知之數了。一直到里根 (Ronald W. Reagan) 時代，美國與蘇聯的軍備競爭始終在進行，甚至發展到可以用衛星將核彈運載到太空——美國以巨量的太空軍備競賽，壓垮了蘇聯的經濟。中國的「兩彈一星」，

令美國着意；而此後的太空競爭，中國堅持核彈和航天的研發，不接受美國的管束。這個劍拔弩張之勢，持續到今天沒有鬆懈。

前面講述美國歷史上的外交政策作為背景，是為了說明：美國的外交政策是中美關係中最主要的一劑「藥」——「君臣佐使」五味俱全，它處於「君」的位置。而這個「君」，是為了維護西方文化的霸權思想、「圍堵」思想。這才是我們理解二戰以來的世界這個複雜的大棋局，很重要的一個原則。

五 「麥卡錫主義」下的留美華人

二戰以來，眾多中國留學生在美國深造，包括我在內。我們到這兒來求學，是因為美國學校的課程、設備居全球之冠。這一階段，美國確實也在大量招收外國學生，我們趁此機會來學本事。當然，中國人喜歡落葉歸根。早期通過「庚款」來到美國的成百上千的留學生，大多數都回到中國，主要的工作崗位不是在教育界，就是在實業界。那個時期，中國的科技發展還不是主流，科技人才也就大致分配在上面兩個範圍。

等到戰後，國共內戰，中國一分为二，海峽封鎖，這就成了大問題：中國大陸出來的留學生，在「圍堵政策」的立場之下，美國不讓他們回大陸。最重要的一個例子，就是錢學森。當時美國的物理學是世界前哨，假如中國要發展現代科技的武器，錢學森的參與必定有其貢獻。我相信錢學森在發明導彈這件事上盡了力。但後來中國發展「兩彈一星」，主要依靠的還是當年俞大維的兵工署所訓練的一批軍事武器專家。楊振寧、李政道當年就是被俞大維他們送出來的，這兩位都是西南聯合大學教授吳大猷調教出來的學生。

「鐵幕」開始降落時，美國開始疑忌在美的「左傾」人士。這一事件發生在杜魯門任上，「麥卡錫主義」不僅要擋住那些選擇回到中國或東歐國家的知識份子，而且要鏟除國內的「左傾」份子。所謂「左傾」，其定義就變成「自由份子」——凡是不「右」的，就給他們戴上「左」的帽子。

主要負責此事的，是太平洋國際學會(Institute of the Pacific Relations, IPR)。他們的監視網非常寬廣，籠罩在所有中國研究的基地上——匹茲堡還好，因為不是大基地。如此情況，使得全美的華人都心驚膽戰，不知道哪天聯邦調查局(FBI)或中央情報局(CIA)的探員，會查閱你的來往信件，會檢查你的納稅數目。大家杯弓蛇影，心懷恐懼。1970年我來匹茲堡的時候，還看見了這種現象的遺留。一位姓余的老華僑(到這裏他改名換姓為「林盼」，因為他買了林家的「出生紙」；我們家現在的牙醫就是余家的)到我的辦公室來談話，進來先把門關好，然後輕輕地和我談他們的恐懼，低聲問我：「這個局面何時可以終了？」因為他們有很多家鄉子弟想要出來，但「鐵幕」已垂下；還有那些死在異域的幾十個同鄉，只好先火化，等到有一天帶回故鄉去。最近犬子還訪問了存放骨灰的地點，確實有幾十個罈子在那裏。

到後來「麥卡錫主義」平復了，台灣恢復與美國的來往。1962年我回到台灣，此後兩三年間在母校台灣大學歷史系服務，按照現代的規模、方向安排課程；餘外的工作，就是奉命與美國的學術單位及漢學家聯絡。我的上司是中研院院長王世杰先生，以及史語所所長李濟先生。這個工作非常艱難，有很多人質疑我的立場：你是台灣來的，你對大陸既無影響、又無說服力，怎樣讓我相信你呢？我們如果到台灣去，會不會加重美國對我本人的猜疑？我說：「我不能回答你的問題，但是我回去了，我沒問題啊。」一直到1971年，尼克松與中國大陸開展「乒乓外交」以後，才有大量的華僑青年和留學生回大陸；隨後同樣有大量的留學生從大陸過來美國，比從台灣來的多十倍都不止。

1956年，楊振寧、李政道二位先生提出「宇稱不守恆」定律；隨後，吳健雄女士以試驗證明了這一理論——這三位都是世界著名的物理學家。楊先生因其父親還在大陸，中美關係一鬆動他就回去了，從此沒有斷絕過與大陸的來往。他也很努力地將美國現代物理學的研究情形引介到國內，幫助國內的學者。數十年來，他本其初衷，幫助了許多學生留學，為大陸物理學的發展盡了自己的力。

我曾有幸與他以及劉遵義一起，幫助余紀忠先生在中國設立「華英文教基金會」，目的是幫助中國大學的教員出國，做短則半年、長則一年的進修。只要他們提出訪問單位、目標、計劃、時間，以及美國的邀請函或接收的承諾，還有校內給出的推薦信，我們就盡力在專業的方向評定其次序。看見



2000年許倬雲（前排右三）與楊振寧先生（右二）一同出席華英文教基金會第一屆第三次董事會議，攝於南京大學。（圖片由許倬雲提供）

如此多優秀的學者排着隊，準備作更進一步的努力，於我而言是件非常愉快的工作。遺憾的是僧多粥少，我們無法滿足每個人的願望。因為這一項工作，楊先生與我們每年碰面一次。除了我們對各校講演以外，我也有機會向他請教。

後來，我們同時在香港中文大學做訪問，經常會一起喝茶聊天。如此交誼，我對他欽佩有加：老而不失童心，聰明而沒有凌人之勢。他在專門的學問達致巔峰，而且對一般事務非常了解。最可佩之處是：對像我這種年紀的後輩，他完全是坦誠相交，使我與他談話感覺如坐春風。

六 美國在亞洲、中東的擴張

兩次越戰對美國的衝擊，其實比韓戰還要大。韓戰中美國損失了四五十萬軍人，這在美國歷史上是空前的；而兩次越戰，美國都沒有討到好處——這兩次越戰延續，加在一起幾乎有三十年之久，尤其是第二次美國從越南撤退，狼狽不堪。

戰爭中不使用毒氣，這是國際公約。二戰期間，美國與德國之間、美國與日本之間，都遵守了這一原則。但是，日本人常常在中國戰場使用毒氣。美國在越戰也使用了毒氣，今天越南的幼兒之中，有畸形兒、難產兒；美國在越南森林之中散布的毒氣，至今還瀰漫於空氣中，這都是造孽。

在俄國控制範圍之內，東歐與北歐、南歐的國家，數次嘗試脫離被奴役的地位。每一次這種事情發生，CIA都深度介入，造成動亂。有的後果是國家改制、新的政權出現，但政權能夠維持穩定的，只有1956年6月「波茲南事件」和10月「匈牙利事件」。餘外，中東的埃及、阿爾及利亞、利比亞等地中海岸回教國家的「顏色革命」，沒有一次不是破壞了原有的秩序，建立另一個集權政治，獨夫獨裁；而那些國家原本已經開始的經濟建設，幾乎停步。

從地緣政治而言，中東是必爭之地，這片地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產區。美國用盡心力，從控制沙特阿拉伯開始加以掌控。沙特是英國當年從波斯帝國分離出來、獨立的酋長國，後來變成酋長世襲的一個「闊財主」——不需要治理國家，他們收錢就行了。沙特有一百多個王子到倫敦訪問，一買就是一層樓；那些首飾、手錶、衣服，他們的妻妾都需要——沙特的一個王子，可能有一百多個妻妾。這種腐敗、落後、荒唐的國家，是美國「心愛的寶寶」——為了他們的基地以及石油資源。

1948年，猶太人回歸故土，居然在耶路撒冷旁邊切出一塊土地，重建以色列——單單靠流亡的猶太人，能有這種力量嗎？實際上是英國和美國在背後支持。英國在戰後一蹶不振，以色列的主要支持者是美國。這個國家有它可佩之處，「無中生有」，很快就把國家建設得像模像樣。希伯來大學的水

平，不亞於中國的頭等大學，不亞於美國的一流大學。台灣的軍事研究院，常常請教以色列顧問幫助解決導彈問題，也請他們來幫助解決建立核電站的問題，這些人都是頭等專家。我去過以色列好幾次，人們紀律嚴明、生活簡樸、奮發有為。但幾十年來，以色列慢慢敗壞了：當年建公社的勇氣、嘗試與學習的心態都喪失了。最近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 (Benjamin Netanyahu) 因為貪污而被法辦。可是，美國必須維護以色列。

美國深入干預中東政治，為了獨佔石油資源，發動了數次戰爭：海灣戰爭、科威特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然後緊接着，是伊朗戰爭。最近，美軍才從阿富汗狼狽撤退。每次戰爭到最後，是頹垣殘壁，當地被破壞得不成樣子。美國經常不用正規軍來打仗，而是花錢僱來傭兵——這些人無所不為，沒有軍紀、無視法律。我不知道這種罪孽，給中東造成的負擔有多重。三十多年的戰爭，將中東打得稀巴爛，地中海南岸、非洲北岸的國家，到今天元氣還沒有恢復。美國將伊斯蘭世界之中可能成為穩定因素、重建地區秩序的國家通通打爛掉，現只剩土耳其還是完整的獨立國家。

這些都是「圍堵政策」延伸出來的後果——美國擴張成癮，每位總統任上都有了一批將軍希望擴張。與美國當權者有密切關係的黑水國際 (Blackwater Worldwide) 公司，專門做僱傭兵生意，殺人成千上萬，一個個國家被毀壞，他們不用負責任。中東的阿聯酋也是美國主導下的產物：將這一帶幾個小酋長聯合在一起，建立「聯合酋長國」——那裏有全世界最奢侈的酒店，停靠着世界上最豪華的遊輪。

實際上，戰後的日本，相當於美國的「殖民地」。在韓戰中，日本為美國提供後勤補給、維修保障，也借機將二戰時的老舊設備全盤更新。1970年代，日本的工業輝煌一時，其生產率全世界最高。世界上日本商貨遍地，豐田汽車、松下電器、西田百貨，等等——日本商人所在之處，當地房價能翻兩三倍。東亞一帶的經濟，也隨着日本起來了，所謂「雁行理論」——中國大陸沿海地帶，也在這一波經濟榮景之中佔了一角。如此情形，美國不能接受：「我將你扶植起來，現在你反而騎到我頭上，將我的買賣都搶佔了。」於是收緊銀根、提高關稅、專利索賠等手段齊施，三年之內將日本打到地下，到今天還沒爬起來。所有著名的日本品牌，美國公司都佔有股份。

台灣比日本聰明，當年的建設不用美國的品牌，像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這種企業，都是自己申請專利權——台積電生產了全世界80%的芯片。當初設計台灣經濟模式時，就考慮到日本的前車之鑒。台灣的長榮海運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航運公司之一。香港董家、包家的船業公司，運輸的也是以美國商品為主，現在被美國「卡脖子」了；希臘的大船隊也是如此，挪威的大船隊美國卡不住。所以，這個「龍頭」不講江湖義氣。中國江湖上的龍頭老大，是老大吃虧、小弟兄佔便宜。美國這個老大是：「你做了我的小弟兄，就得聽我的，隨我處置。」如此行徑，怎不令人失望？最近美國在提高中

國的關稅，又以台灣問題要挾大陸。從東方到西方，美國的如此行為，使得其領導的國際圈內怨聲載道。

七 「美人遲暮」，是最令人傷心的事

數十年來，我們也見過美國曾經的榮景，百年繁華。1957年我到美國，正好在報紙上讀到：一個非裔小學生要進入白人學校而被擋住了；國家動員了該州的自衛隊，以政府的力量，將民眾的反抗壓下去。這種「黑白」之間的糾紛，至今沒有停歇過。因為黑人群體仍舊陷落於社會底層，即使金 (Martin Luther King, Jr.) 作了多大努力，也於事無補，種族糾紛問題，如今變成「種族惰性」，弱勢種族不再爭自己的權利，反而去爭政府的失業津貼。從數字上看，美國缺工 120 萬，失業人口只有 25 萬，差不多 100 萬人在領政府的失業津貼，不願意出去工作。生之者寡，食之者眾，經濟就走下坡路了。

美國科技迅速發展，今天的數字化、自動化、人工智能到此地步，廠房裏面不見下層工人，只見工程師、檢查員。1970年，我從台灣到匹茲堡大學教書。當時一次大罷工，白宮震動，全國不知道怎麼辦。今天如果再有同樣的事情發生，是否能同樣撼動國家？一個國家假如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實質上是靠國家「社福基金」養活的，政府稅收不夠用時，只能靠印鈔解決。支撐美金實質的力量，應當是國際貿易和國內的所得稅，但實際上卻是一團亂賬。很多美國公司，收入在別處，富餘的錢存在國際戶頭。如今美國的經濟搖搖晃晃，所有貨幣發行限額等經濟學上的定律，都不遵守。

從 1980 到 2008 年，兩次巨大經濟危機，都是信用問題、貪污問題、虛假抵押等問題所致。原本，這都是資本主義制度不容許發生的問題，因為健康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靠信用承諾。兩次經濟危機幾乎讓美國經濟崩潰。最近的美國經濟，本該是大恐慌、大不景氣的時候，居然出現物價回漲、股價回漲的情形——我們都看得出，其中有假。如此情形說明，美國這個國家在自我欺騙。但國內有如此多弱勢群體在依靠國家的津貼生活，長此以往，怎麼辦？這些弱勢群體，擁護不講理的激烈右派，該怎麼辦？羅斯福當年倡導的「四大自由」很對，但現在「第五個自由」出現了：「別惹我」的自由。要不要工作、是否上學，等等，大家都認為是個人的事——如此「獨立精神」，不是健康的獨立精神。我希望中國的年輕人不要「躺平」——但是，世界的潮流似乎在這樣發展，怎不令人擔憂。

十幾年前，我寫了一篇有關美國社會反思的文章，後來發展為一本書：《美國六十年滄桑：一個華人的見聞》。那時候，我批判美國將要面臨的危機：政府官僚化、社會渙散、鋪張浪費——尤其浪費在軍事、國防上。然而，政府該做的事情卻並沒有盡到責任：全國的硬件設施，橋樑、機場、公路、水泵很多壞掉了，卻沒人管。當前美國社會，最重要的問題是國家精神渙散：

政府天天在爭吵的，是墮胎是否合法、變性人的權利，等等——不是說這些問題不重要，而是說這些話題佔據了大家的注意力，淪為政客譁眾取寵的項目，真正關乎國計民生的事情反而沒人管。這個國家正在淘空自己的精神文化、經濟實力，這個國家正在走向浪費、走向懶惰、走向消耗、走向空洞化。

「9.11」以後，美國以報復恐怖份子為口號，在中東介入無數糾紛。為了懲罰他們，美國在外戰上消耗有多大？得到的醜惡名聲有多少？國家多少的實力花在殺人上面？花在僱傭槍手上面？花在一架架無人機上面？歷史上最驕奢的羅馬帝國、最浪費的法王路易十四 (Louis XIV)、最野蠻的俄國沙皇，他們的驕奢、浪費，都沒有美國如此嚴重。假如美國經濟這條大船沉沒，像我們住在美國的人會跟着被淹死，全世界經濟會隨之沒頂。如此危機，該如何挽回？這是令人徹夜難眠，也想不到出路的問題。但是美國如此敗象，確實已經很難彌補。

近年來，有很多批評美國資本主義的書，但對於這些批評聲音，美國的政客不願意聽，或者來不及聽——對於他們，最要緊的是如何抓到選票，入主白宮。社會上一般的議論認為：特朗普 (Donald J. Trump) 是瘋子，拜登 (Joe Biden) 是老糊塗——這樣的人在治理當今的美國。當年我開始寫《美國六十年滄桑》時，至少有十二本書和大量批判美國的文章可用——今天我去查，這些自我批判的書沒有了。可是，有識之士還是在批判，《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大西洋雜誌》(The Atlantic)、《禮拜六評論》(Saturday Review)，少數的幾個記者和評論家不斷提醒：危機就要到了。「火馬上要燒起來了」，可沒人注意。這件事令我不但感覺心酸，而且心傷。本來美國這個「理想國」湧現於人間，大家認為這是人類的期盼。到今天，像福山 (Francis Fukuyama) 還在講：「美國模式是人類歷史的終點，我們做到了。」此情此景，怎不令人傷心？我也勸告國內的「唯美派」，不要唯「美」是尚。「美人遲暮」，是天下最令人傷心之處。當年曾見其絕代風華的人，能不感慨萬千嗎？尤其此國之衰，會影響世界各處。

其實對美國現況的批判，我內心何嘗不痛苦？我曾看見美國人奮發努力的時候，看見美國民主運作是許多人努力的累積，看見美國對窮國、小國的援助，甚至於教會在各地對教眾的支持和教育，都是令我欽佩的。而且，我曾經盼望美國的民主自由政治體制，有不斷的進步和因時的修改。因此，今天看見美國社會的渙散、政治的庸俗，在國際關係上又如此地驕橫而不知點檢，大家可以想像，美國這個社會，從記憶中的美好形象，居然一變而為現實中破碎的殘鏡，我心情之悲苦，不言而喻。